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新世纪 中国社会学(2006-2010)

“十一五”回顾与“十二五”瞻望

▶ 本书由总报告和18章构成。总报告就是整个社会学学科调查报告；18章就是18个重要的分支社会学的分报告，包括理论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社会思想史（含社会学史）、社区研究、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社会发展研究、社会人类学、社会问题研究、妇女研究（含家庭社会学）、社会保障、社会工作、信息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等领域。

郑杭生/主编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新世纪 中国社会学(2006-2010)

“十一五”回顾与“十二五”瞻望



► 郑杭生/主编

主要作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 丹 王 继 风笑天 田毅鹏

乔亨瑞 关信平 刘少杰 张李玺

李友梅 李 强 杨 敏 陈文江

林聚任 郑杭生 钟涨宝 童 星

蔡 禾 潘允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纪中国社会学 (2006—2010): “十一五” 回顾与 “十二五” 瞻望/郑杭生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ISBN 978-7-300-14068-1

I. ①新… II. ①郑… III. ①社会学-研究-概况-中国- 2006~2010 ②社会学-研究-远景-中国- 2011~2015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6660 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新世纪中国社会学 (2006—2010) —— “十一五” 回顾与 “十二五” 瞻望

郑杭生 主编

Xinshiji Zhongguo Shehuixue (2006—2010)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mm×23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5.5 插页 2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字 数	421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总报告：中国社会学“十一五”期间研究回顾与“十二五”期间 发展瞻望	1
第一章 理论社会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75
第二章 社会思想史（含社会学史）研究回顾与瞻望	112
第三章 社会学方法研究回顾与瞻望	129
第四章 社区研究回顾与瞻望	144
第五章 城市社会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163
第六章 农村社会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176
第七章 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回顾与瞻望	190
第八章 政治社会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226
第九章 经济社会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244
第十章 组织社会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261
第十一章 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研究回顾与瞻望	277
第十二章 社会人类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294
第十三章 社会问题研究回顾与瞻望	307
第十四章 社会保障研究回顾与瞻望	331
第十五章 社会工作研究回顾与瞻望	343
第十六章 妇女研究和家庭社会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355
第十七章 科学社会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370
第十八章 信息社会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387
后记	402

总报告：中国社会学“十一五”期间研究回顾 与“十二五”期间发展瞻望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学科调研工作的通知》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经讨论，制定并下发了《关于编写社会学学科调研报告总报告与分报告的实施意见》，确定社会学“十二五”学科调研按总报告和分报告进行。分报告包括理论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社会思想史（含社会学史）、社区研究、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社会发展研究、社会人类学、社会问题研究、妇女研究（含家庭社会学）、社会保障、社会工作、信息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等近 20 个分支社会学领域，每个领域的分报告由一位学科评审组专家牵头负责（其中城市社会学报告聘请评审组以外的专家负责），组织学科调研和报告的撰写。

本报告是在全面检索和梳理 2005 年至 2010 年 6 月间中国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了以上部分已提交的分报告的研究成果撰写而成的。本报告对“十一五”期间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趋势、取得的主要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做了梳理与分析，对“十二五”期间的发展趋势、研究的重点领域做了分析，并提出了“十二五”期间社会学重点研究课题指南。

第一部分

“十一五”期间社会学的主要进展、 重要成果及问题

一、“十一五”以来社会学发展的总体态势

“十一五”期间，社会建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为社会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种种纷繁复杂的问题，也对社

会学的解释和回应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社会学家及时抓住机遇，认真应对挑战，实现了社会学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无论是在理论构建上，还是在对现实问题的政策性回应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得社会学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理论基础更加坚实、研究方法更加专业、学科地位更加巩固。从总体上看，“十一五”期间社会学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良好态势。

第一，立足现实，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回应意识和回应能力不断提升。

社会学必须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作出理论的概括，对转型中出现的问题给出理论的解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社会学界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意识和回应能力比较欠缺：不少学者要么沉醉于西方理论的概念游戏之中，不关注中国的现实；要么沉溺于统计数字和琐碎的个案事实之中，或用西方的概念、框架硬套中国的经验素材；还有一些学者停留于发牢骚式的批判。在过去的5年中，“提升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等倡导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将自己的理论研究建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给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对社会转型的回应意识大大增强。同时，由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使得社会学对社会转型的回应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在理论上，研究视野开阔、领域扩展，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变迁获得了俯视性及统揽性的把握；同时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和细化，越来越切近对象世界的微观细节，使理论研究对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一种系统性和覆盖性的效果（郑杭生，2008：83）。在方法上，CGSS（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国内社会学主要教学与研究机构组织实施）等全国性、连续性调查的开展，使得中国社会学家们能够及时、全面捕捉到中国社会的变迁，并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给出解释和对策。

第二，开发传统，对中国社会学传统资源的开发更加自觉。

经过30年的恢复与重建，中国社会学逐渐走出了移植西方社会学的窠臼，开始致力于找回传统、激活传统、超越传统阶段，实现了学术自觉。寻找自己的“学统”，并致力于在现代性背景下形成中国社会学的“新传统”。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发掘和认识中国社会学的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因此，在过去五年中，有学者用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重写中国社会思想史（郑杭生、胡翼鹏，2007、

2008、2009；郑杭生、江立华，2010）；有学者重新探究西方和中国社会学的起点、早期历史和脉络分流（刘少杰，2007）；有学者提出要重新找回中国社会学“丢失的传统”，对民国时期的“社会学中国化”历程展开再研究（田毅鹏，2005）；有学者提出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以中国经验为基础，从根本上再造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2006）；还有学者尝试用中国的概念，如“气”（应星，2007）、“义”（吴飞，2009），来诠释当下的问题。也正是在“重解学术经典，再造学术传统”的旗帜下，不少学者致力于整理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陆学艺、王处辉，2007；曾亦，2007）、中国社会学经典文献（谢立中，2007；李培林，2009）工作，一批清末民初以来的经典社会学著作也得以整理出版。

第三，借鉴国外，与国际社会学界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更加密切和富有成效。

中国社会学在国际社会学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过去五年中，中国社会学界与国际社会学界的学术交流更加频繁，学术对话更加有效，中国学者在对外交流中奉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越来越具有主体意识。继2004年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国际社会学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委员会”2009年年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等国际顶尖的学术会议纷纷在中国举行。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2007）、“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2007）、“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学：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2008）、“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08）等一大批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也在中国举行。“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研究课程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举办，2007）、“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方法”论坛（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从2005年开始，每年1期）等高质量的研修课程也越来越频繁出现在国内社会学界。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系都开设了大量由国际一流学者讲授的课程，如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专门由国际一流学者授课的国际小学期。总之，中国社会学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社会学在国际社会学格局中的地位也越来越

重要。

第四，创造特色，使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意识不断提高，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稳步推进。

正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意识不断提高，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正在逐渐形成。继差序格局论、学科边界扩展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之后，“十一五”期间，中国社会学界又提出并初步阐述了实践结构论、感性选择理论等新的理论视角，其中有些理论进一步得以讨论和完善。而且，社会学界越来越重视运用这些理论视角和概念框架去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意识和反思意识越来越强，基本思维方式越来越成熟，社会学的本土化正在稳步向前推进。

二、“十一五”以来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对于社会学在“十一五”期间的研究成果，重点从以下 20 个研究领域加以介绍。

（一）社会学理论研究

理论的发展对知识的积累和整个学科研究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十一五”期间，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坚实的进展，呈现以下趋势。

1. 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导向更加明确

1997 年和 2003 年，费孝通分别提出了“文化自觉”和“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两个命题，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导向奠定了基础。“十一五”期间，社会学界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这两大命题，使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导向更加明确。

郑杭生（2009）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提出了“理论自觉”的概念，提出要对“两类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从而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他还提出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应该发扬“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2007）与“顶天立地精神”（2009）；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既不赞同

“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所谓“顶天立地”精神，即前沿与草根相结合的精神。

许多学者进一步阐述了费孝通关于“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思想。刘少杰（2006）提出要克服社会学研究因单纯强调科学精神和客观原则而导致的经验化、技术化和表层化倾向，将经验研究上升到概念思维或理论逻辑的高度。邱泽奇（2005）从中西学术传统的对比中发现中国学术传统的认识论强调天理与人性的统一，因此提出要凸现社会学的人文关怀。田毅鹏等强调对中国人文学科的传统进行重新检视和开发，“找回丢失的传统”，建立起社会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勾连，是社会学扩展自身传统界限的关键（田毅鹏，2005；田毅鹏、刘拥华，2006）。

2.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更加深化

“十一五”期间，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取得了重要进展，传统的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互构论得到了更加深入的阐释，实践结构论、感性选择理论等新的理论视角也被提了出来。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差序格局理论进行了反思和发展。翟学伟（2009）在进一步阐述差序格局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指出了隐喻方法与逻辑推理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这一理论的缺陷。廉如鉴（2009）分析了差序格局理论与梁漱溟的伦理本位理论之间的尖锐分歧。阎云翔（2006）分析了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之间的关系，强调差序格局不仅包括横向的“差”，也包括纵向的上下尊卑的“序”，而后者常被人忽视。马戎（2007）则通过中西对比，分析了差序格局背后所包含的社会结构、宗教基础以及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还有学者分析了差序格局从“乡村版”走向“城市版”的趋势（张继焦，2005；于光君，2006）。

“十五”期间，郑杭生和杨敏提出了社会互构论的主要思想，在“十一五”期间，这一理论得到了系统的阐述（郑杭生、杨敏，2010），该理论对时代转型的大趋势作出了独特的回应，无疑是中国社会学理论构建的一个里程碑。在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的基础上，近年来，郑杭生、杨敏（2008）又提出并初步阐述了实践结构论这一新的理论视角，继续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走向深化。刘少杰（2005）在揭示理性选择研究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感性选择理论，并用这一视角分析当前中国的种种经济社会现象。

3.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

这一时期，出现了多本对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和介绍的著

作，如杨善华和谢立中主编（2005—2006）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下卷）、刘少杰主编的《国外社会学理论》（2006）和《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2009）、高宣扬著（2005）的《当代社会理论》、文军主编（2006）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等等。这些著作对于人们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脉络和理论体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现代性、公共性、全球化、风险社会、制度主义等经典理论主题上，这一时期也有不少突破。在现代性问题上，有学者系统探讨了经典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回应方式（王小章，2006）；有学者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反思转向、叙事转向、修辞转向，以及其如何走出传统的现代性，以从理论上应对信息社会、消费社会、世界社会、风险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成伯清，2006）；有学者提出了“新型现代性”的概念，以区别于传统的“旧式现代性”概念（郑杭生，2006），并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作了新的解释，分析了“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机制（郑杭生，2006）；学者们对国家与市民社会（邓正来、亚历山大，2005）、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2005）、社会和谐与公共性（郑杭生，2005）、社团合作与中国公民社会（高丙中，2006）、社区建设与公共性（黄平，2010）等主题进行了探讨。在全球化问题上，有学者探讨了全球化时期的文化冲突和共生（苏国勋等，2006）；有学者探讨了社会学理论应对全球化的方案，提出要建立“全球化研究范式”（文军，2005）。在风险社会问题上，最重要的进展是“个体安全”概念的提出（郑杭生、杨敏，2007）。关于制度主义的研究，林克雷等（2005）分析了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制度主义范式；李路路（2006）分析了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机制的关系；刘少杰（2006）分析了制度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兴衰历程，并提出要重建制度社会学的主张。还有学者对话语建构论（谢立中，2010）、现象学社会学（杨善华，2010）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4.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更加系统

2004年开始实施的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郑杭生、刘少杰（2006）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相关主题做了系统深入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批重点编写教材《社会学概论》在郑杭生等首席专家和相关咨询委员会专家与国内社会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历时6年，已完成任务，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相关重大议题上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

（二）中国社会思想史、社会学史研究

加深对中国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学史的研究是认识传统、找回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形成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解释范式和概念体系的重要基础。“十一五”期间，在这方面取得了以下进展。

1.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

（1）从“思想家评述”到“思想命题”研究。从思想命题的角度理解社会思想史，不仅使学科的问题意识更为明确，而且具有延续性。郑杭生、胡翼鹏（2007、2008、2009）从社会运行论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理论传统的内在亲和性出发，用社会运行论重新系统梳理了两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各个思想流派的主张。陈劲松（2007）以“儒学社会”为主线展开分析，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前儒学社会”、“儒学社会”和“后儒学社会”三个阶段。王君柏（2007）提出要从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风与俗、文与质、理想与现实等范畴出发开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郑杭生、江立华主编（2010）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借助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视角来分析诠释中国社会思想中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通过意义的发现、阐明、转换，使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有机镶嵌在社会运行的理论框架中，进而使涵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混沌空间在结构上清晰起来——建构起与社会运行理论统一的知识构架和话语体系，在内容上具体起来——展示出历代思想家关于传统社会治乱盛衰的思考与实践。

（2）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陆学艺、王处辉主编的6卷本《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包括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宋元明清卷、近代卷和现代卷）出版，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从上古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历代社会思想的基本面貌。此外，曾亦主编（2007）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读本》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3）关注“民间社会思想”研究。传统社会思想史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思想经典”展开的，而民间思想、民间信仰则被忽视。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民间社会思想，并尝试通过对非经典文本的解读，来把握民间社会思想的特性。如王处辉等人（2007）通过对《水浒传》的研究，来观察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夏当英、王处辉（2007）从民俗、民谣、民谚、家谱、小说、评话、蒙学等方面探寻其中所蕴涵的传统社会生活理念。

（4）“田野的思想史”的方法取向。社会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最新的动向是主张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思想不仅保留在他们著作里，同样保留在

民间日常行为、仪式、信仰和观念里面，主张通过田野考察来把握民间的思想史（杜靖，2010）。可以预见，未来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将为社会思想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支持，获得更为丰富的理论成果。

2.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1）对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发展史的研究。刘少杰（2007）的《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对中国社会学的经学渊源和西学来源做了认真的梳理，在中西学术的历史交汇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演化，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的社会学理论做了深入而充分的讨论，评析了梁漱溟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结构特殊性的社会学理论，并且对费孝通晚年大力倡导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思想主张进行了深入分析。

（2）关于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史料的整理。中国社会学史料的选编和出版是找回中国社会学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这一时期，关于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史料整理的成果主要包括：李培林等（2009）选编的《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下册），谢立中（2007）选编的《中国社会学经典读本》，以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库”丛书整理出版的梁漱溟、瞿同祖、李景汉、李安宅、杨庆堃、詹承绪等前辈社会学家的著作。

（3）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学重建的研究。在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社会学界也对 30 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展开了系统的总结和反思，代表性成果是郑杭生主编（2008）的《中国社会学 30 年》和李强主编（2008）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1978—2008：社会学》。此外，田毅鹏（2005）、应星等（2006）都认为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在研究规范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存在简单移植西方社会学、缺乏对自身传统的开发等问题，主张应该努力找回传统，激活传统，超越传统，实现学术自觉。

（三）社会研究方法

方法的发展对于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十一五”期间，社会学界在方法研究上更加强调“方法论的自觉”。

1. 对方法论的反思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社会学研究基本是不加反思地移植西方的研究方法，强调“规范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这种

做法,提出“既要规范化又要本土化”的主张,如潘绥铭提出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并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方法研究”;边燕杰、李路路、蔡禾(2006)结合CGSS调查的实践总结了“中国社会调查的本土实践经验”;风笑天(2005)认为要实现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与本土化,必须处理好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理想状态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关系,加强对研究论文的方法评价。

王天夫(2006)重新界定了因果关系的概念,分析了因果分析对于社会研究而言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并结合当前社会研究中的某些不足,提出了应用因果分析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技术。庄孔韶(2007)提出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应该注意面(比喻为“蝗虫法”)与点(比喻为“鼯鼠法”)的结合,发挥多学科融合的优势。

此外,潘绥铭和黄盈盈(2009)强调,社会调查必须在研究伦理的框架之内进行,任何以“人”为对象的社会调查都需要贯彻知情同意、平等与尊重、无伤害与受益三项基本研究伦理,并要求调查者要真正地做到为被调查者着想、以“平常心”对待。方长春(2006)从方法论和本土实践两个角度出发,探讨调查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

2. 对定量研究方法的探讨

在“十一五”期间,随着CGSS、CFPS(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等全国性的大型社会调查的开展,国内定量研究逐渐趋于成熟。

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从问卷设计到资料分析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新的讨论。其中,潘绥铭(2008)强调专业的问卷调查应该重视和突出“元假设”;赵延东(2007)对受访者推动抽样(RSD法)的理论渊源、基本思路、主要操作步骤和原理进行了研究;张丽萍(2009)对Kish表在中国运用提出改进建议;风笑天(2006)考察了社会调查中区间法和填空法两种收入测量方法的特点与问题,并针对前者容易出现的“端点累积”现象和后者容易出现的“特殊整数点累积”现象进行了探讨;宋时歌和陈华珊(2005)分析了如何用纵贯性数据和生长模型来回答关于“变化”和“趋势”的研究问题;刘瑛(2005)将人工神经网络引入社会统计分析方法,以弥补社会统计常用的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等方法将变量间复杂的函数关系简单线性化的缺陷。

此外,有学者对计算机辅助调查、网上调查、e-mail调查等新的研

究方法进行了研究（夏传玲，2007；王东、潘绥铭、黄盈盈，2008；潘绥铭，2009；宋春艳，2010）。还有学者通过西方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方法论范式的分析，以及国际一流社会科学杂志论文的总结，勾勒出经验社会科学研究“洋八股”，即问题、理论（文献）、假设、数据、测量、方法、发现和结论，这种范式反映出后实证主义逻辑（彭玉生，2010）。

3. 对定性研究方法的探讨

（1）定性研究的类型。黄盈盈、潘绥铭等（2008）将现有的定性研究方式分为求同法、求异法、求全法三种类型，这种划分有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的冲突。

（2）个案研究中的意义、代表性、表述。杨善华（2007，2009）主张访谈既应当以“悬置”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态度进入现场，同时又要随时保持反省；对意义世界的认知经由感知与洞察完成，从而能够获得对现象意义的相对深刻与准确的理解和解释。个案的代表性问题一直是困扰个案研究的难题，朱晓阳（2006）提出了“个案延伸”的方法，卢晖临和李雪（2007）提出了两种分析性概括以及扩展个案方法两种处理方式，谭同学（2009）提出了“类型比较视野下的深度个案”研究方法。个案如何表述也是个案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应星（2006）分析了近年流行的“叙事”这种表述方法的功能及其限度，冯仕政（2010）认为如何处理表述文本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科学哲学问题，而不纯粹是一个写作技巧问题。

4. 围绕研究方法的争鸣

“十一五”期间，社会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展开了多场激烈的争论，对社会学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应星和仝志辉等就“华中乡土派”所主张的“广泛的田野调查”和“野性的思维”等研究方法展开争论（应星，2005；仝志辉，2005；吴毅等，2005）；张扬（2007，2009）与尹海洁（2009）围绕证伪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可行性问题展开商榷；风笑天（2007）和郝大海（2007）就抽样中的样本替换与应答率、抽样调查下样本的随机性与代表性和敏感性问题的抽样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张静（2006）和李雪（2006）还围绕吉尔茨的认识论问题展开争论。

（四）社区研究

“十一五”期间，随着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开展，社区研

究也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1. 社区与社区建设

对于社区的定义、实质内涵式等问题，多数学者认同官方的定义，即“社区是具有一定地域范围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认同感、归属感、依附感等社区情感是社区的最重要的意涵（单菁菁，2005；丁元竹，2007）；也有学者对现代城市社区的“共同体”追求提出了质疑（桂勇，2005；陈宁，2006）；还有学者指出，当代社区具有地域空间和社会网络两种空间形态，应努力实现二者的系统性互动（陈福平、黎熙元，2008）。

如何开展社区建设？郑杭生通过对全国十几个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系统考察，认为社区建设就是要在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构建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共同体，中国社区建设的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以党建为龙头带动社区建设；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将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途径是社区制度创新，重点是改善民生，目标是共建共享和谐社区。同时，他还提出中国社区建设的一些新理念，如复合治理、通过服务实现治理、国家与社会互构合作、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相互转化等（郑杭生，2007、2008、2010；郑杭生、杨敏，2010）。徐永祥（2006）认为现行的社区建设体制难以承担社区的社会发展、社会民主、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的制度角色，必须通过社区建设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积极培育民间社会组织，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努力构建现代性的、政府与社会分工合作的体制。

2. 社区服务与社区治理

通过社区服务改善社区民生是社区建设的首要目标。江立华（2008）认为社区福利是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以社区为基础，整合和协调社区内外的社会资源，为解决社区居民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问题及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由政府的公共体系、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性福利服务。孙朝阳（2007）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困境及对策。还有不少学者就社区养老等具体社区服务内容展开了研究（李宗华等，2009；赵立新，2009；周建国，2010）。

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等各种主体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杨敏（2007）认为社会转型和社区建设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李友梅（2007）认为社区作为一个

满足居民生活、居住的实体，其资源供给系统日益复杂，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多元共存，社区公共事务越来越依赖多种组织或系统参与决策和执行，因此，社区正在走向“共治”。周红云（2009）认为社区治理单位的重构是社区改革的主线，当前社区治理的趋势是社区治理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自上而下的管理逐渐转变成合作治理；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逐步形成社区多中心治理局面；治理过程和方式更趋民主化和科学化。向德平（2006）分析了社区组织的行政化困境。针对“社区自治就是让政府走开”的观点，郑杭生（2007）指出，自治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自治是一种关系”、“自治是一种分工”、“自治是自助与互惠的结合”、“通过自治推进社会合作”，通过自治理顺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它们能够协调、合作。关于社区治理的具体模式，学界提出“参与式治理”（王敬尧，2006）、“权变合作主义”（何艳玲，2007）、“四轮驱动、一轱协调”（王雪梅，2005）、国家与社会互构合作（郑杭生、杨敏，2010）等主张。

3. 社区动员与参与

“社区冷漠症”，是制约社区建设的瓶颈。多位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刘少杰（2009）认为其原因在于“社会主要成员不在场”，即由单位制和当代社会生活脱域等因素影响，城市主要社会成员（职业群体）的主要社会活动不在城市社区之中；黎熙元、陈福平（2008）认为随着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居民的社会支持网逐渐从社区内转移到社区外，导致了居民的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减弱；还有学者从利益结构和利益卷入的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熊易寒，2008；李骏，2009）。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对现行以“属地管理”为基础的社区建设模式进行一些反思和调整，加强社区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要注重社区资本的培育，实现社区建设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统一（潘泽泉，2008；桂勇、黄荣贵，2008；刘少杰，2009）。

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近年来因为利益冲突——特别是物业纠纷——而频发的社区维权。何艳玲（2007）分析了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抗争三个层面的逻辑：通过媒体声援将特定的地方性问题变成公共话语；运用说服性沟通策略使抗争行动合法化；建构共识性危机使潜在动员者变成实际参与者。桂勇、黄荣贵（2009）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分析了互联网如业主论坛在社区集体抗争中的作用。曾鹏（2008）考察了不同社区网络如何影响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表现形态和绩效。张磊（2005）运用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和利益集团

理论研究中国城市业主维权运动的产生原因和动力机制。陈鹏（2010）用“法权抗争”——包括“上访维权”、“诉讼维权”和“立法维权”三个基本类型——的分析框架分析当前中国城市业主维权。

（五）城市社会学

“十一五”期间，城市社会学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在城市化道路、城市发展模式、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空间等方面都有新的研究成果。

1. 城市化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就面临着如何推进城市化的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小城镇模式，即农村城镇化占据主流地位。但随着小城镇战略的推进，其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先后提出了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均衡发展论（又称城市体系论、多元模式论）。“十一五”期间，这一讨论更加深入。有学者对“城市化”这一思路本身提出了质疑，如温铁军（2005）认为将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一战略值得反思，田雪原（2006）提出在城市化战略实践中应该吸取人口城市化“拉美陷阱”的教训；潘允康（2006）则认为，大城市有“聚集经济优势”和“聚集社会优势”，而且有成本低、符合人的本性的追求等特点，因此其超先增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王明美（2006）认为我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应因地制宜，大、中、小并举，宜大则大，宜中则中，宜小则小；李强（2009）提出在大城市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和小城镇模式三种模式外，还应该有一种第四种城市化模式，即“乡村生活的城市化”，即乡村仍然保留，但机械化的劳动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现代的文化生活及闲暇生活等都与城市中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本质区别。

2. 城市发展模式研究

郑杭生认为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主要依靠土地、廉价劳动力、矿物资源、环境代价等初级资源的发展模式逐渐走到了尽头，需要重新解放思想，进行制度创新。他主编的“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就是希望总结各地在这一背景下制度创新的经验。目前，这一丛书已出版了杭州卷和郑州卷，无论是杭州“复合社会创业主体”的新理念和新模式，还是郑州的“三化两型”国际大都市的建设实践，都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郑杭生等，2009；杨敏、赵君，2010）。潘允康（2008）从系统论的视